



民国風流

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潘剑冰·著

有非常之时代，方有非常之爱
有非常之爱，方有非常之时代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民国風流

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潘剑冰·著

有非常之时代，方有非常之爱
有非常之爱，方有非常之时代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风流：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 潘剑冰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5
ISBN 978 - 7 - 5060 - 7485 - 8

I. ①民… II. ①潘…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5941 号

民国风流：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MINGUO FENGLIU: NAXIE WUFA KUAGUO DE KUAGUO LIAN)

潘剑冰 著

责任编辑：鲁艳芳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24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60 - 7485 - 8

定 价：32.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2 64258115 6425811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127

序 言

说到一个国家或者朝代的开放程度，涉外婚恋的数量和活跃度是一个很典型的衡量标准。试看历史上的唐朝，多少老外娶了中土女子而乐不思胡，乃至终老异域；同时又有不少美丽妖艳的胡姬与唐朝男子两情相悦，携手制作出一道道风流大餐。“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没有这些妖娆迷人的胡姬，大诗人李白的酒兴和诗兴准得降低不少。

遗憾的是，唐朝以后便一代不如一代，于是，风流才子与美艳胡姬软语温存的情景如盛唐的诗歌高峰一样成为了绝唱。降至清朝，以鸦片战争为界，国人对于洋人的态度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前者傲慢。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花甲记忆》中写道：“在英国首次打败清朝之前，外国人在坐轿子碰到清朝官员时会被半路扔到街上。”后者恐惧。鸦片战争后，形势逆转，此前来自西方的洋人见了中国皇帝还得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清朝的大小官员们见了洋人如小鬼见了阎王，面对百姓时的威风到了洋大人跟前荡然无存。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两种态度都没有把洋人当“人”看，这也难怪，那时进来的很多洋人都不是“人”。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洋人走进来，不同国家、种族的人们开始有了更真实的接触，大家揭开私密的面纱，走进彼此的世界，赫然发现：那些普世的情感放之四海而皆准。

到了清末，第一批跨国婚恋应运而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曾任清朝驻法公使的裕庚一家。裕庚的第一任夫人早逝，1884年，他在担任

驻日公使期间找了一位洋夫人续弦，他们生下了两个漂亮的女儿，即后来在慈禧身边任御前女官与翻译而红极一时的裕德龄和裕容龄这对姐妹花。裕德龄后来嫁给了一位美国人，而裕庚与前妻的儿子裕勋龄也娶了一个法国女孩为妻，这事儿在法国曾引起轰动。

裕庚身为大清官员，而且是清室的远支宗亲，属于八旗子弟，竟然敢于打破祖宗规制与“蛮夷”通婚，不禁让那些卫道士们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过那个年代敢于“吃螃蟹”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前，包括裕庚自己也活得小心翼翼。裕庚曾在1901年被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到：国人常把“洋人”比作“鬼子”，自己家中“鬼子”较多，“鬼气”太重，所以担心国人诽谤，常常心惊肉跳。

反过来，西方人同样对与中国人通婚抱着敌视与排斥的态度。清末民初众多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1899年，在广东的女传教士哈尔佛生与一个名叫蓝子英的当地人好上了。当他们即将举行婚礼时，广州竟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美国驻广州副领事，要求他出面阻止这桩婚事，并卑鄙地提出，这位女传教士一定精神有问题，应该请医生为她诊治一下。副领事回信说美国法律没有不准美国公民与华人结婚的条文，因此不便出面干涉，这对中美恋人才得以喜结连理。

后来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于1908年到美国留学，并前后在美国待了将近十年。他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仿佛与外面的世界绝缘，男人留着辫子，女人甚至还缠足，卖卦算命的大行其道。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持着旧有的课程，学生们每天高声朗诵四书五经，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它毫无影响。在此情况下，更别想象什么中外通婚的事情了。

不过辛亥革命的来到改变了这一切，革命以后，“短短几年时间，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蒋梦麟《西潮新潮》）

这是唐人街的变化，国内的变化同样令人瞠目。日后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著名历史学家陶希圣于1922年在北大法科毕业，192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据他叙述：按商务印书馆的规矩，若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生，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三尺半宽二尺，坐硬板凳；若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月薪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四尺宽二尺半，坐藤椅；若是欧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月薪二百元，坐藤椅；若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哈佛、耶鲁等欧美名校的毕业生，月薪二百五十元，待遇顶上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藤椅外还有接待来客的便椅。陶希圣只读过北大，“土鳖”一个，因此初入商务印书馆时，月薪八十元，待遇最低，用的是三尺长半尺宽的小桌子，坐硬板凳。（参阅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通过陶希圣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十几年时国内“崇洋”风气之盛。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郭泰祺于1904年赴英留学的时候，清政府发给其家里安家费白银二十两，结果郭父因这笔钱被乡里人嘲笑为用二十两银子把儿子卖给洋人，郭父又羞又气，竟然悒悒而死！（参阅喻血轮《绮情楼杂记》）

前后不过二十年间，留学生从清末的社会边缘人物成为民国的时代弄潮儿，一场辛亥革命让整个中国突然从慢车道走向了高速公路。当中国精英大量走出去的同时，西方人和我们的东洋邻居也蜂拥而至，来他们印象中“人傻钱多”的中国淘金，于是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进而跃居远东第一大城市。这样的双向“对流”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频繁地擦出火花，于是民国涌现出了大量中外融合的爱情故事。

现在很多中国人比美国人还开放，所以大家对于涉外婚恋已不觉得新鲜，但两个时代的涉外婚恋如果拿来做比较，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其一，现在中外男女结合，如果对方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中方为女多男少；如果对方来自越南、柬埔寨这类落后国家，则中方为男多女少，经济搭台、爱情唱戏，无可厚非。但在民国，外国女子的进口与中国女子的出口呈现出高度的“贸易逆差”，几乎都是中男配外女。这出自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的出国人员和留学生基本上都是男性，极少有女性；

二是社会对于女人的宽容度远不如男人，男人要是娶了外国女孩可以用风流来做挡箭牌，女孩子要嫁给外国男人那只能是下流了。

其二，那个年代的跨国婚恋相对于现在要纯粹得多，他们大都是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现在有很多涉外婚姻属于动机不纯的无爱婚姻，有女的嫁给富国男并想以此为跳板的，有男的娶个穷国女想“脱光”（脱离光棍）的。而在民国时期，很少有不同国度的人因为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走到一起，那时大家都还相信爱情。

话又说回来，不管是民国还是现在，跨国婚恋的失败率都非常高。失败的原因各有异同：相同的是国家之间固有的地域、种族、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差异；不同的是现在很多人视爱情与婚姻如儿戏，流行“快闪”式的婚姻，动不动就“闪婚”或者“闪离”，而在民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比如说，那时的中国男人大多不是“包办婚姻”就是早早娶妻，等到他们出去留学，碰到自己喜欢的外国女孩，一度“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灵与肉有过交战，但最后为了家庭的责任不得不忍痛割爱，胡适、季羨林是也。再则，民国时期虽然比晚清进步得多，但大多国人思想都还没开化到接受一个洋媳妇或者洋女婿的地步，有的地方甚至不准洋夫人入族谱，死后也不得进祠堂，一些大家族尤其如此。现在很多人以生混血儿为荣，而以前混血儿则被视为“杂种”而备受歧视。这样的社会压力无形中让很多相爱的异国恋人在婚姻的门槛前望而却步，也让很多已经结合的异国夫妻最终劳燕分飞。

在对方的国度，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人的偏见也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潘大逵 20 世纪 20 年代到美国留学，发现很多白人女同学在课堂上还跟有色人种打交道，但在大街上相遇就装作不认识了。这种情况在美国西部最严重，到了美国中部要轻一些，美国东部就好很多了，因此，在纽约一个中国留学生要同白人女孩恋爱远比在加州来得容易。在欧洲，不同国度的情形也差别很大。1919 年跟着徐悲鸿一起到法国留学的蒋碧薇在回忆录中就谈到当年法国人对于有色人种不太歧视，留学生要找一法

国太太并不是难题，后来贵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就带了一个法国女郎苏珊回来，这大概源于法国人的浪漫精神。但在向来保守的英国，问题就棘手多了，所以尽管戴乃迭的父母都是来华多年的传教士，但她的母亲还是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和俄罗斯女人为妻的人数着实不少，这固然因为俄罗斯盛产美女而日本盛产贤妻，更源于两国比邻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时代背景。到日本留学虽然像吸“二手烟”，但由于其近便和速效的优点，被很多人视为“价廉物美”的最优选择，留学人数上远超过去欧美的。而且到日本留学的很多是干大事的有志青年，他们见多识广，再加上很多纨绔子弟也赶时髦到日本镀金，且日本又是个性观念较为开放的国度，因此很多留日生别的没带回来，日本女人倒落实了。至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风流韵事，那更是“罄竹难书”啊！

娶俄罗斯女人的大都是“十月革命”后到苏联学习经验的中国工农革命者。红色苏联建立后，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恩断义绝，本来大量出口的俄罗斯美女囤积国内，让这个女多男少的国度患上消化不良。远道而来的中国工农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他们在苏联被看做亲人，好比基督教的“兄弟姐妹”，于是亲上加亲也就手到擒来了。

“十月革命”的爆发也导致大量的白俄女子跑到中国来，笔者的母校华东师大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上海滩洋人和富人们热衷的郊外度假村，名为“丽娃栗姐”，茅盾的《子夜》中曾多次提到这个地方。校内有一条丽娃河，关于这条河有一个美丽伤感的传说。据说这个度假村原属于西班牙人，后来转让给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流亡白俄贵族。彼得罗维奇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丽娃。丽娃爱上了一位中国的穷书生，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阻挠。最后，在一个下雨的春夜，她跳进了这条河里。这样的故事也许只是传说，但白俄女子与中国男人的爱情悲剧却一定真实存在，类似的故事也会发生在那些流亡中国的犹太人身上。

中国男人和日本女人或俄罗斯女人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往往因政治而发

生，也正因为如此，也最容易受政治的干扰。日本的侵华与战败、俄罗斯与中国的冷暖变化都给这些跨国夫妻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折磨，他们的爱情注定要历经坎坷。乱世中，战争的动乱与政治的高压是很多跨国夫妻不能白头偕老的重要原因，但也因有了众多反面的对比，那些坚守真爱、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才显得更加动人。

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在那样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里，来自不同国度的情人们演绎了一出出凄美的旷世绝恋，他们之间的爱情，其波澜壮阔与荡气回肠都远非今天充斥市面的这些痴男怨女们的靡靡之音所能比拟的。

笔者在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日记以及其他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的考证，取其精华，弃其皮毛，提炼出这十个“无法跨过的跨国恋”，相信读者朋友们看完之后，会有这样的感悟：伟大的爱情可以超越国别、超越种族、超越时代、超越物质、超越政治，乃至超越形式！

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十个跨国恋故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叙民国史。由于民国只存在了38年，书中所选的十个故事不完全始于民国终于民国，但它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展现了民国的历史，合起来恰好是一部独特的民国史。

陆征祥和蒋百里亲自见证了民国的开始，陈纳德和蒋经国又亲自见证了民国的结束，他们都处于风暴之眼，对时代鼎革的感受远比普通人来得强烈，历史的巨变不仅给他们自己，也给他们的家庭与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胡适、杨宪益和邵洵美则用他们各自的爱情诠释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各种风貌，胡适与韦莲司五十年的柏拉图之恋正是新文化与旧伦理“天人之战”的缩写，杨宪益与戴乃迭归国后的遭遇也正是无数自由主义“海归派”的遭遇，邵洵美与项美丽则用一场短暂而唯美的爱情向永远不老的民国“致青春”——今天我们再回首民国，常常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气勃勃而感到吃惊！

萧三与李立三的故事是那个多元时代中硬币的另一面。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纠结与选择是无数的民国精英们都不得不直面的人生难

题，这样的纠结与选择往往影响到个人的爱情、婚姻与家庭。萧三与叶华的爱情故事，既有“左右逢源”的幸福与喜悦，也有左右不两立的争斗与苦痛，他们的遭遇，简直是一部完美的政治隐喻诗。李立三和李莎的缘分始于“左”，又终于“左”，而他们在“极左思潮”下的悲剧命运实际上于民国时代已经可以找到端倪了，偶然中孕育着必然。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是改变民国走势的重大事件，书中的主角们全部历尽了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在不同位置、不同角度分别见证乃至书写了历史，通过比较和综合，我们也可以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

孙中山创立民国、袁世凯复辟、外交痛史、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党“清共”、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西安事变”、全民“抗战”、延安整风、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

我不是在书写爱情，我是在讲述历史。



序言 / 1

陆征祥与培德·博斐 / 1

——乱世有真爱，弱国无外交

蒋百里与左梅 / 25

——用爱情见证民国的军阀时代

胡适与韦莲司 / 45

——新文化与旧伦理的“天人之战”

邵洵美与项美丽 / 67

——向不老民国“致青春”

杨宪益与戴乃迭 / 87

——自由“海归”派的人生影像

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 / 117

——在刀锋上舞蹈的“傀儡”

李立三与李莎 / 147

——一曲“极左思潮”下的命运悲歌

萧三与叶华 / 171

——真爱不分“左”与“右”

陈纳德与陈香梅 / 195

——激情“抗战”岁月的美好纪念

蒋经国与蒋方良 / 215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主要参考文献 / 237

陆
征
祥
与
培
德
·
博
斐

——
乱世有真爱，
弱国无外交

导语

一个是拖着辫子的中国外交官，一个是出身比利时军人世家的大龄剩女，他们的结合注定要从世人惊诧的目光中走过。从《马关条约》到『二十一条』再到巴黎和会，陆征祥与培德夫人的爱情和婚姻见证了从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弱国无外交』的苦痛历程，其间的屈辱、挣扎与抗争，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是很难体会的。而他们在生死相依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与温暖放在那个熙熙攘攘、蝇营狗苟的时代黑幕中，正如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不仅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也将带来惊天动地的回响。



(一)

189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沙皇宫廷舞会，一场奇妙的邂逅发生了。

男主角名叫陆征祥，清朝驻俄使馆的翻译官，他穿着笔挺的西服，操着熟练的法文（当时欧洲上流社会交际不会讲法语会被人视为“土包子”），穿梭于蝴蝶一般的夫人小姐之间。陆征祥娴熟礼仪，兼具西方男人的风度和东方男人的儒雅，这为他赢得了不少青睐的目光，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培德·博斐（Berthe Bovy）的比利时女士。

培德·博斐是一位比利时将军的孙女，其父亲是比利时国王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培德当时正随担任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罗核居住在圣彼得堡，靠给人教授法文为生。凭借着罗核的关系，培德经常出入沙皇宫廷的各种宴会、舞会，她谈吐高雅、舞姿优美，是很多异性眼中的焦点。

出于对东方男人的好奇心，培德走向了陆征祥，一阵客套的寒暄后，培德与“郎”共舞，这一舞就是三十年。这一年培德已经40岁，或许是因为贪玩，她一直坚持着独身主义，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她喜欢的人面前，她热烈得仿佛十七八岁的小女孩，一汪秋水仿佛高纯度的酒精，随时可以将你点燃；而陆征祥尽管只有24岁，但身上的成熟与稳重却超越了他的年纪，或许是因为身世的坎坷与国家的多难，他的眼里总有一种动人的忧伤，这在虔诚的天主教徒培德看来，忍不住想去关怀与怜悯。

尽管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年龄相差达16岁（而且是女的大），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相爱了。在他们恋爱的第四个年头，培德已经44岁，陆征祥意识到，再不结婚，自己的爱人就老了。但是，在走向婚姻的圣地前，陆征祥必须先翻越两座高山：一是他的父亲，二是他的恩师。



陆征祥

陆征祥 1871 年出生于上海，产后母亲即患重病，浑身水肿，卧床数年后撒手人寰，那时他才 8 岁。其父陆云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以助基督牧师传教为生，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又当爹又当妈，辛辛苦苦将儿子拉扯大。陆云峰思想新颖，不愿意儿子走上腐朽的科举道路，送子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那年头学外文和出洋留学还难登大雅之堂，会被人认为是在依附蛮夷，有“假洋鬼子”的嫌疑，何况陆云峰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

陆征祥进上海广方言馆前曾在私塾补习了两年古文，他聪颖过人，已经小有所成，日后再自学不辍，始终以儒家的精神来鞭策自己，完全是一个外洋内儒的人。13 岁陆征祥入广方言馆时，主修法文，到了 21 岁，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推荐入北京同文馆深造，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不过那时人才紧缺，他入同文馆还不到一年，总理衙门便一纸调令下来，让他赶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充当中国驻俄大使馆的翻译。陆征祥原本以为这不过是自己人生中一段短暂的插曲，他的计划是先出洋历练一番，任满回国后在上海的邮局谋一份差事，与父亲过上安逸的生活。岂料在驻



俄使馆一待就是13年，他的人生也因此转向。

当时的清朝驻俄公使为许景澄，这是一位翰林出身的外交家，他对清朝官僚的腐败以及朝廷的无能十分愤慨，见到出身贫民、朴实无华而又聪明好学的陆征祥后十分中意，有意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那年头当外交官并不像今天这么风光，和洋人打交道本身就为“君子”们所不齿，且在落后挨打的中国，外交官对外矮人三分，对内帮朝廷“擦屁股”，费力不讨好不好不说，还时常要背黑锅，被人骂汉奸，两面挨耳光。所以，陆征祥并不太乐意接受这桩苦差事。

但是许景澄的诚意打动了陆征祥，于是他写信征求父亲的意见。陆云峰十分开明，接到儿子的来信后，回信道：“人贵能自理耳，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海，毋以父为念。”四十余年后，陆征祥回忆起这封来信，仍然为父亲的大义凛然感动不已。

陆征祥正式拜了许景澄为师学习外交，不过为了避免使馆同人嫉妒，他们的师生关系是保密的。尽管如此，许景澄对陆征祥的教诲可谓不遗余力、事无巨细，不论公务多忙，功课无日断之，小到外交礼节上的一言一行，大到立身处世之道，许景澄无不循循善诱，以他堂堂朝廷大员的身份，毫无报酬、认真负责地教导一个小小的翻译，这样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终其一生，陆征祥都在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着一位贤良的老师。”甚至许景澄去逝后，陆征祥每遇一事，都要先想念老师的遗训。

正是因为有了许景澄的栽培，陆征祥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翻译才有机会出入俄国宫廷各种高级的外交场合，他和培德的相识相爱，可以说是老师无意插柳的结果。然而，尽管许景澄是清朝官吏中难得一见的开明分子，但他从一位长者的理性角度出发，却极不赞同爱徒的婚事。

当时中国的风气未开，连舶来的洋玩意儿都要退避三舍，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的时候，连戴着眼镜的人都要被抓去砍头，更何况是娶一个外国女子！这被很多人视为有辱祖宗，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洋媳妇和她生下来的孩子既不能进家族祠堂，也不能入祖坟。西方女人热爱自由，而中国